

绪 言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入侵即墨，它们不但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对即墨人民进行直接压迫，而且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上层建筑，把即墨的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统治和奴役即墨人民的工具，即墨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军事上受侵略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此后百年的时间里，帝国主义的铁蹄纷纷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偌大的中国被瓜分得七零八落。各帝国主义国家象发疯一样，强占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劫掠财物，杀人放火，其罪恶罄竹难书。然而清王朝由于政治腐败，经济窘迫，军备松弛，面对列强的侵略只能俯首从命，屈辱就范。因而一部中国近代史沾满了中国人民的屈辱和劫难。

即墨虽属一隅之地，然而由于地处祖国黄海前哨，尤为帝国主义所觊觎，即墨人民亦由此倍受蹂躏。

1897年，德国政府以山东“巨野教案”^①为借口，强行要求租借胶州湾。胶州湾是我国的天然良港，海防要冲，原为即墨县辖区。1891年清政府派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驻防于此。德国帝国主义对于胶州湾垂涎已久，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梯尔匹茨亲自来胶州湾窥探。1897年2月，德国派河海工程专家佛郎求斯来山东对胶州湾之形势、面积、水土性质、风俗民情、资源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制定了详细的开发计划，上报德皇威廉二世，为其占领胶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是年11月1日，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德皇认为时机已到，便以此为借口，密令其远东舰队司令棣利斯率领四艘巡洋舰奔袭胶州湾。14日晨，德国海军陆战队以借地操练为名由栈桥西边登陆。继之，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攻击，迫使清军退至四方村。12月1日，德兵又突袭驻沧口的清兵，有五名清军官兵和两名无辜百姓中弹身亡，大批军事装备和物资被劫掠。腐朽的清政府面对德国的大兵临境，一味退让，不仅不做抵

抗，还下令将章高元部调往烟台。因而不到半年时间，德军即占领了胶澳地区。

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与之签定了屈辱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将即墨南部的仁化乡及胶州湾一带划为胶澳租界。从此，胶澳地区陷入德军的铁蹄之下，即墨亦多次遭其袭扰。

1898年1月，驻胶澳德军500余人，侵入即墨城，驻扎于孔庙和西关质库（当铺），并分兵把守城门，强迫知县朱衣绣交出地丁册籍和地方志书，并追问大小鲍岛地价。朱衣绣以未奉上谕不敢擅专而拒绝。23日夜，一名防守西门的德军酗酒滋事，被居民李象风杀死。德军于深夜闯进县署，将知县掳去扣押，并立逼其将李凤祥处死。2月初德军撤回青岛，城中财物被劫掠，文物亦遭破坏。

1900年7月30日德国骑兵20余人突袭即墨县城，知县许涵敬命令将城门关闭。德兵从东门城墙入城内，并鸣枪示警。居民赵启刚走出家门，即遭德军枪杀。随后德军闯入县署，挟持知县见其长官，知县许涵敬据理与德军官争辩，德军才暂时退去。31日德军100余人由敌酋舒来率领再次闯入县署，以湍湾、挪城大刀会袭击驻南泉火车站为借口，勒索白银4000余两，然后离去。

德国侵略者为了修筑胶济铁路，强买民田，迁坟移屋，引起沿路居民的不满。即墨县南泉、蓝村一带居民自发组织了大刀会，他们驱赶丈量人员，拔掉路标，袭击驻火车站的侵略军。1900年9月，德国侵略军派出洋枪队准备血洗大刀会驻地戴家庄（今属南泉镇）当他们遭到大刀会的阻击后便疯狂地枪杀民众，炮轰村庄。大刀会会员戴秀珍等12人于战斗中壮烈牺牲。德军进村后，村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在村外捉到一个瞎老汉，将其残杀。

1912年1月，即墨革命党人周敦恂、宋兆麟等率领民众袭击了县署，拘禁了知县，组织了革命政权。德国殖民当局闻讯后，立即派出130余名骑兵，气势汹汹地驰达即墨城南，无理斥责革命党人违约用兵，并企图以检查枪械为名，窥探革命军实力。随后，又急电济南，要山东抚署派兵镇压，辛亥革命即墨起事遭德国侵略者和清军的联合镇压而夭折，几十名民众惨遭杀戮。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于龙口登陆，随后，侵占了掖县、平度，19日，日军主力侵入即墨。日军司令官步兵第十八师团长神尾光臣沿途发布告示，令中国官民：“遇有我军所求，各宜效力，帮助我军，以便行动，是为至要。倘有阻碍我军行动。立即查拿，从严惩办，毫不轻贷。”因而日军所到之处强征滥收，任意劫掠。18日，日军岫内支队于仰

口登陆。日军于此铺设直通即墨团彪庄的轻便铁路，同时在县内建立多处军供转运站，一时间，即墨成了日军的后方和军需补给基地。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日军在即墨毁坏耕地 侵占民房 强征民夫 烧杀劫掠 奸淫妇女 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害。据当时的即墨一位举人记载：方日本之初至墨也，在城南花园为粮台，运兵运饷 昼夜不绝 城东南村庄 蹂躏不堪言状。”9月15日，一小股日军窜抵即墨西北乡的毛家岭村（今属段泊岚镇），强占了村民毛可象的住房后，便强迫供应，抢劫财物。村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因而横遭大祸，当场被打死打伤10余人 抓走5人。第二天，日军又派来大队人马，一进村就鸣枪射击，挨户搜查。最后纵火焚烧村庄，致使36户164间房屋被烧毁，使近200人无家可归。另外，日军杀害无辜的惨状，令人发指。据一位目击者记载：“甲寅之秋，德日构兵，吾邑人横死者多矣。而张烈妇袁氏之死尤为惨烈。烈妇即墨河西袁某之女，十八而于归，二十二而遇难。当日军之入境也，居民纷纷逃匿。烈女避之某村，突遇数兵逼之，大骂抗拒不从。临以兵 骂愈厉。乱刃交下 肢惨腹裂 妊子已八九月 男也 将诞矣。见者咸歔嘘 太息泣下。”桑园一老农，因阻止日本兵进家糟蹋其女，竟被日军开枪打死。此次日德交兵，给即墨造成的损失难以数计。是年12月，仅上海红十字会即赈济即墨灾民棉衣数千套 银元16000元。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和地方土匪势力也派兵进驻即墨、城阳一带，在即墨争夺地盘，烧杀抢掠，人民群众天天在死亡线上度日。

经济上受剥削 帝国主义侵入即墨以后，即墨城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被瓦解，但封建剥削制度占有显著的优势。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操纵着即墨地区的经济命脉，即墨人民完全丧失了经济自主权。

1914年，日本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他们在山东掠夺矿产资源，大量倾销日产商品，把山东变为日本的工业市场。日本人操纵青岛地方奸商包办盐业输出权，垄断青岛地区的盐业买卖。纵容盐警对沿海群众敲诈勒索，肆行迫害，对过往群众，强行搜查，发现携带包裹者，也不问包内有何物，举棒就打。即墨各商号和群众不愿忍受他们的剥削压榨，纷纷联合出钱购买枪械，成立百余人的商团，保护即墨的商业经营。在济南读书的学生江乙黎、刘民生等回乡发动即墨第一模范学校师生百余人上街演讲，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并在城西关商店查获一批百货，当众销毁。

1914年，即墨的盐民联络莱阳、海阳等地盐民联合起来反抗盐税，火烧了金口的盐务局。即墨、胶县、莱阳、平度四县的盐民还到胶澳督办公署请愿，要求取消盐

业输入权，成效甚微。

文化上受控制 自德国帝国主义入侵即墨后，先后在即墨办起了教堂、书院、医院等，对即墨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渗透。1898年，德国传教士卢威廉受德国信义会的派遣，由青岛来即墨县设会，在县城西关共济门里租房传教。1905年在城南花园村建立教堂、办书院，在胡家村南设医院。后来，又陆续在王村、丰城、白庙、下疃、俞家屯、泊子、蓝村等地设立教堂。1913年，德国天主教神甫陶加禄购下旧参将署，建立天主教堂，并附建女院，设小学和诊所。他们利用这些所谓的“慈善”场所进行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和奴化教育，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把中国人民当作他们的驯服工具。

即墨人民的抗德斗争 面对帝国主义对即墨人民的残酷摧残和奴役，即墨人民并没有被洋人的淫威所吓倒，而是勇敢地站起来，组织起大刀会等群众组织，不屈不挠地进行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

1899年春即墨各地的“大刀会”以“反教灭洋”为宗旨，高喊“消灭洋鬼子”、“不信耶稣、天主教”和“将洋人驱出中原去”等口号，到处焚教堂、逐洋人。即墨西乡的大刀会一举抄了天主教徒59户；南乡以傅二为首的大刀会用石头击毙4个洋人和3个教徒，并风言大刀会在崂山山谷间铸造火炮，在河流庄村制备刀枪，将尽逐洋人出境，誓与教会决一雌雄。5月15日，全县的大刀会组织聚起1000余人，各执刀枪、棍棒、土炮，涌向县城，向县衙和外国教会示威。吓得外国传教士不敢下乡传教，众教徒也都闻风丧胆，相继外逃。

1899年8月，湍湾村大刀会会同挪城大刀会100余人，向在南泉村北小桥一带巡逻的德军发起攻击，迫使德军退回南泉火车站。大刀会继续向车站德军发起攻击。1900年秋，德军洋枪队到戴家庄骚扰，该村大刀会联合挪城大刀会，埋伏在该村的桃源河畔，截击德军。大刀会先用土炮击毙了一名向戴家庄瞭望的德军军官，继而挥动大刀、长矛、铁锨等从各个伏击点杀出，给洋枪队以重创。洋枪队组织火力抵抗，戴家庄大刀会首领戴秀珍等12人在战斗中中弹牺牲，会众4人受伤。大刀会通知群众转移后，主动撤出了战斗。

1898年，即墨城北关李象风刀劈一名为非作歹的德国兵；1899年南泉“大刀会”刀劈德国传教士；1900年，南泉北泉村群众为反抗德国人修铁路，三次拔掉德国

人设的路标。这些斗争事例说明，即墨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即墨的法西斯统治。

轰动京城的德军毁坏即墨文庙圣象案 1898年1月22日 驻胶澳德军100余人，突然侵入即墨县城，驻扎于文庙和西关商户店铺内。23日夜，一名在县城西门站岗巡逻的德兵，因酗酒滋事，被居民李象风杀死。事发后，德军于深夜闯入县署，将知县掳去扣押，并立逼其将李象风擒拿处死。德军此次侵扰即墨城，不仅劫掠去大量财物，还将即墨文庙中的圣象四体伤坏，将先贤仲子的双目挖去。知县朱衣绣只将李象风杀死德兵一事据实上禀，而对德兵毁坏圣象一事匿而不报。

1898年春，恰逢戊戌科会试，各省举人云集北京。4月22日 即墨举人黄象毅串联山东举人103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告发德兵毁即墨文庙圣像一事。同时，赴京会试的孔孟后裔孔广馨、孟昭武等17人亦联名签署《为残毁圣象 任意作践 公恳据情代奏折》上陈都察院。都察院连接两份言辞激昂的上书后，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全台署名，将两份上书一并呈递给光绪皇帝。一时间，京师舆论哗然。

此时，正处于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一面接连向光绪皇帝呈奏折，要求朝廷发奋维新；一面寻求时机，力图策动参加会试的千余名举人联合行动，以造成声势，向顽固派施加压力。因此，当康、梁等人得悉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士兵骚扰即墨县文庙事件引起公车的愤慨后，大为振奋，便立即行动借机发难。康、梁等人迅即于公车中散发了一封言辞激切的公开信，鼓动各省举人联合行动，维护孔教尊严，以挽救中国之危亡。5月3日，以康有为的弟子林旭为首的369名福建举人首先响应，他们联名向清廷递交了《为圣象被毁，圣教可忧，请飭总理衙门责问德人公呈》。继之，湖北举人李家群等165人，湖南举人易顺豫等43人，以及安徽省举人洪滢和广西举人万象葵均联合上书都察院。他们在上书中对德兵毁即墨文庙圣象的狂悖行径严辞斥责，并列举波兰、印度等国因失教而失国的教训，要求清政府从“保教以保国”的立场出发，严肃处理此事件。5月4日 江苏省松江府举人庄仁泳等31人向都察院递交了《即墨文庙一案关系重大，请旨严诘德人交犯惩办 以伸公愤》的公呈。同日 江苏省举人汪曾武等204人亦递交了《为至圣象毁，乞飭总理衙门责问德驻京公使，迅速查办，以安人心》的公呈。5月6日 江苏省淮安府举人程人鹄等17人在向都察院的上书中指出：“侮圣慢贤，实欲借欺蔑圣教

之端，为挫折中国人心之计，非寻常欺侮可比。”要求清廷严正处置。同一天，由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麦孟华、梁启超等人领衔，有 831 名广东举人联名签署的上书，使这次公车上书达到了高峰。他们把即墨文庙圣象被毁事件的严重性，提到了保卫孔教，维系人心，立本强国的高度。严正指出：“割胶澳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圣象则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过此。……责令查办毁坏圣像之人，勒令赔偿，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

康、梁等维新派人物除在各省会试举人中鼓动上书外，还极力策动京师各衙门的官吏呈递陈条，以扩大影响。5月8日，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冈和徐桐代奏了翰林院编修李桂林及朱祖谋、修撰骆成驥、检讨阎志廉等 24 人的联名公呈。5月13日，都察院又向皇帝代奏了由李桂林领衔签名的计 154 人，其中不仅有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还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员和国子监、光禄寺、都察院的司员。他们在公呈中指出：“去年胶澳之事，彼曲我直，不能遍告各国与之理论，友邦已共议其失机。今德人此举，行同盗贼，非但中国所同愤恨，应亦外国所共非议矣。我若能仗义执言，径相诘责，则各国知我人心不死，必有出而衡其是非也。”不然“恐天下人心无复有亲上死长之义”。

由于康、梁等维新派人物的推动，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一时之间成了轰动北京的重大事件。前后在上书中签名的各省举人及京师官员达 2000 余人次之多，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以此一事件为契机的多次上书，为维新变法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德国交涉，着驻胶澳之德军首领向我方赔礼道歉。即墨知县朱衣绣也因对此事匿而不报被革职。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慑于德国侵略军的淫威，未敢严厉惩治毁坏即墨文庙圣像的罪魁祸首，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最终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时期的即墨起义 1897 年胶澳地区被德国侵占后，以《环界条约》为借口，德军 4 次入侵即墨，干涉即墨政事，形成了外侮内患交加。即墨知识阶层的周敦恂、陈献堂、隋子孚、宋兆麟、刘子恒、杨新三、王君堂等 20 余人。受到“民主、共和”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是当地最早的一批革命党人。他们开展革命宣传，发展组织，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其时，同盟会的山东负责人刘冠三屡次到即墨鼓动举义。按山东同盟会的筹划，先在青州举义，再占取诸城，并与即墨、高密等县的起义军互为声援。

1912年1月为响应武昌起义 反抗即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 即墨同盟会会员周敦恂、陈献堂、隋自孚、宋兆麟等 20 余人成立了保安会，组织了百余人的起义军 决定于1月27日举行起义。1912年1月27日夜，即墨起义军在城外炸了警察局并缴其军械等，炸开了城西门进入城内，与城内起义军百余人包围了县署，燃爆竹伪作枪声冲入县署，县署中官吏闻声惊慌逃匿。革命党人将库房万余两库银充作军费，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并拘禁了知县张同皋。28日 张贴布告 宣传革命旨意，全城居民都悬白旗以示归顺。革命党人在考院设临时民政署，召集商会会长苏如箴及城中士绅李中法、周界业等开会，公推周敦恂为财政长兼军需，宋兆麟为军事司令，负责军务，孙毓坦任民政长。会后张贴布告安民，招募兵勇，分守城防。1月30日 青岛德军骑兵 130 余人和清兵 500 人驰抵即墨城，在城外一阵鸣枪，然后攻入城内，逐户搜查，对革命党人疯狂镇压 17 名革命党人惨遭杀害，并悬首示众。起义军为保存实力，尽量减少牺牲，全部由东门退出，一部分赴烟台求援，后转赴高密会合革命军，一部分潜伏乡间藏匿。1916年春，革命党人为纪念死难烈士，特开追悼大会，纪念在辛亥革命即墨起义中惨遭杀害的荆会孟、黄昌海等革命党人。会后，立“烈士碑”一座“烈士碑”现存于即墨市博物馆。

辛亥革命即墨起义虽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了，但它作为即墨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了即墨 260 多年的满清封建统治，结束了即墨一千多年的封建知县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即墨和青岛周边地区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不断高涨。

辛亥革命即墨起义失败原因，主要是领导这次起义的即墨小资产阶级具有自己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两种性质。结果，这场起义正是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所扼杀。

起义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放手发动广大下层群众，特别是没有充分组织发动全县广大农民建立自己强大的革命武装。它们没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作为这次起义的坚强后盾，也没有与兄弟县的革命党联合起来。他们实力单薄，寡不敌众，这就是他们在德军和封建势力联合扑来时，毫无反抗力量。

辛亥革命即墨起义的失败充分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可能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

第一编

即墨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10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即墨的传播及 即墨籍早期共产党员的活动

一 马克思主义在即墨的传播

正当即墨人民在黑暗中苦苦探索、寻求光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 7 月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给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它像万丈光芒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即墨的革命形势、即墨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党的一大之后，“一大”代表邓恩铭^①肩负党的重托，来青岛开展工人运动，从事建党活动。1923 年夏，邓恩铭经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介绍，在《胶澳日报》社谋得编辑一职。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创办了《胶澳副刊》，并以这块舆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情况，曾在《胶澳副刊》上登过《列宁传》等文章。这是在青岛报刊上首次介绍马列主义。

在与进步师生、工人的交往中，邓恩铭常以赠书或以推荐进步书刊等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邓恩铭又在《胶澳日报》社、启新书社、青岛书店等处设立了 3 个代销处 代销进步书刊 其中有《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共产主义初步》、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邓恩铭利用公立学校的有利条件，主动接近学生和工人、群众，进行发展团员和开展学运工作。两个多月时间 在公立职业学校、电话局、四方机厂、海港码头等处的学生、工人中 发展了 10 名团员（在职业学校读书的即墨籍学生许兴业是其中之一），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支部书记。这是青岛历史上的第一个团支部。不久，团支部又发展了 33 名团员。其中即墨籍的就有 5 人。他们是：在职业学校读书的林礼周，在西镇小学教书的王官赏、钟玉千和在四方机厂做工的于维功^②、刘书堂。许兴业被任命为第二团小组组长。

团组织建立后，邓恩铭在青岛开始着手中共党组织的建立。1923年8月，成立了中共青岛组。1925年2月，成立了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在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在这个时期中，即墨籍的于维功、徐子兴^④、李兆歧^⑤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青岛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这些早期的即墨籍的团员、党员，在青岛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同时，经常回到家乡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向亲朋好友赠送或推荐进步书刊。他们还经常在街头广场聚众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民众的觉悟。这些早期党团员的活动，对共产主义思想在即墨的广泛传播起了先导作用，在思想上舆论上为即墨农民运动迅速兴起作了准备。

二 即墨籍早期共产党员的活动

即墨属青岛的近郊区。在即墨早期党组织初建之前，即墨的大批青年投奔青岛学习或就业。在青岛学习、就业期间，他们主动接近进步人士，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人罢工斗争，并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在这批即墨籍的有志青年中，于维功、徐子兴、李兆歧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除积极参与组织工人的罢工斗争外，还利用回乡的机会，向乡亲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主张，启发了群众觉悟，为大革命时期即墨农民运动的兴起做出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工作。

于维功的革命活动 1924年10月，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到青岛四方机厂领导工人运动，首先发展纪子瑞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2月，邓恩铭和纪子瑞^⑥又介绍即墨籍青年于维功加入中国共产党，于维功成为即墨籍最早的中共党员。

于维功，又名于文成。1903年出生于即墨县湍湾村（今属七级镇）一个农民家庭里。1922年，年仅19岁的于维功考入青岛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学徒。1923年初，四方机厂的老工人自发组织了第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圣诞会”。8月，为抗议胶济铁路无故开除8名工人，于维功等艺徒养成所徒工们参加了“圣诞会”举行的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最后，铁路局被迫答应了让被开除工人复工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年底，于维功等人发起了为抗议厂房无故开除艺徒李可文，四方机厂艺

徒罢工斗争。罢工开始，艺徒们公推于维功、赵世恪、牟洪伦等 10 人去厂长室交涉，要求恢复李可文的工作。交涉未成，即举行了罢工。最终，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厂方被迫恢复了艺徒李可文的工作。

在罢工斗争过程中，于维功和其他艺徒骨干们一起正式成立了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同学会”并公开挂出牌子。此时四方机厂新老工人便形成两个组织，即老工人参加的“圣诞会”和新工人参加的同学会。这两个自发工人组织的成立，为此后四方机厂工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组织开展罢工斗争和成立“同学会”的过程中，于维功在工人中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被地下党员纪子瑞发现。纪子瑞便主动找于维功交谈，不断教育帮助他加深对工人运动的认识，并引导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 年国共合作后，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到四方机厂开展工作。1925 年 2 月，于维功由邓恩铭和纪子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于维功与邓恩铭、纪子瑞等一起开始筹划成立四方机厂工会组织和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在秘密成立工会的过程中，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①同志先后两次到四方机厂指导工作，告诫大家“因争气引起很大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工人的切身利益是增加工资，实行 8 小时工作制，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邓恩铭则启发工人说：“学有学会，商有商会，工人为什么不能有工会……”之后，于维功同纪子瑞、丁子明等深入工人群众当中，积极发展工会会员。到 2 月上旬，四方机厂工人中有 800 余人被发展工会会员，占全厂总数的 60% 以上。在王尽美、邓恩铭的领导下，经过秘密的组织工作，四方机厂工会于 2 月 9 日正式成立，于维功被推举为工会执行委员。

1925 年 2 月，胶济铁路局内的江浙派同山东地方派之间，因权位之争和胶济铁路运价等问题引发了派系斗争，导致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8 日晚 12 时，铁路工人用枕木和钢轨封锁了铁路线，火车司机熄灭了炉火，沿线各站、段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未开出的客、货车一律不许开出，开出的客、货车开到那里就停在那里，不能开动。胶济铁路全线处于瘫痪状态。中共青岛支部分析了斗争形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四方机厂的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中共青岛支部负责人邓恩铭，召集纪子瑞、于维功等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 20 余人，在三育小学开会，专门研究布置举行罢工的有关事宜，提出了举行罢工的五项条件：1、恢复被开除的郭恒祥等人的工作；2 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会；3、不分领班、工匠、小工、学徒，每人每月增发工资 6 元；4 速发年终奖金；5、工人和员司享受同等福利待遇。会上决定以纪子瑞、于维功等

为四方机厂代表，向厂方谈判。结果谈判破裂。纪子瑞、于维功等工人代表向邓恩铭汇报情况时，正值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王尽美在场，他对代表们说：“我们和他们合作本是一种手段，谈判破裂了也很好，不必依靠他们，可以以我为主的罢工。”于是，四方机厂工人在同一天举行了大罢工。在工人罢工期间，胶济铁路总工会在青岛成立，大会推举丁子明为委员长，于维功等被推举为常务委员。胶济铁路局总工会下设青岛、胶县、高密、坊子、张店和四方机厂 6 个分会。于维功等在青岛四方机厂公开挂出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机厂分会”的牌子。罢工持续到第九天，厂方不得不答应工人恢复被开除的 4 名工人的工作等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次日，工会召开了全厂工人大会，庆祝罢工胜利，动员工人复工。会上合照了一张“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分会全体罢工胜利纪念影”。

1925 年 5 月，胶济铁路总工会因援助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人即串通北洋军阀政府胶澳地方当局，宣布取消了纱厂工会，又于 5 月 30 日宣布取消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澳商埠警察厅将总工会牌子摘去后，纪子瑞、于维功等又做了个更大的牌子挂上，警察厅又来干涉。最后，经协商将总工会牌子挂在屋内。

5 月 29 日，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了屠杀青岛工人的“青岛惨案”。接着，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胶济铁路总工会在中共青岛地委书记李慰农^①的领导下，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粤汉惨案后援会”，作为支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组织机构。6 月 14 日晨四方机厂 1700 多名工人参加了游行示威。纪子瑞、于维功等 17 名总工会执行委员，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临时组织的纠察队员分别护卫在队伍的两旁。工人们手拿红绿传单、标语和小旗，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惩办杀人凶手！”等口号。许多市民和学生也主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最后，游行队伍又到警察厅和胶澳督办公署请愿，要求为被杀害的同胞雪耻，释放被捕工人。游行示威直到下午 4 点多才结束。

于维功等参与组织领导的这次罢工游行示威，是青岛工人反帝反军阀第一次大示威，也是青岛工人阶级由厂内斗争走向社会斗争的开始。

1925 年 5 月，济南团地委书记李耘生^②到青岛担任团的工作。6 月召开了青岛基层支部代表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正式委员 5 人 候补委员 3 人。于维功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主持工部工作。

1925 年 7 月，青岛 1 万余纱厂工人举行了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奉系军阀山东督

办张宗昌接受了中外反动派的贿赂，率部来到青岛镇压工人运动。27日张宗昌令其后方司令任锡吾率领大批军警封闭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粤汉惨案后援会，砸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的工会，逮捕了青岛地下负责人李慰农，胶济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丁子明和四方机车厂工人纠察队长赵世恪等10余人，下令通缉邓恩铭、纪子瑞、傅书堂^⑥、于维功等60余人。邓恩铭、纪子瑞、傅书堂等被迫转移到外地工作或到周边农村秘密隐藏，于维功、伦克忠^⑦（后被捕牺牲）等继续坚持在青岛市区内做秘密工作，并到高密等地农村做秘密联络工作，传达党的指示。

1926年5月，于维功受青岛党组织的委派，代表青岛工人参加了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之后，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

徐子兴的革命活动 徐子兴，原名徐国祥，1899年出生于即墨县（今刘家庄镇）大吕戈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徐子兴自幼丧母，7岁时便由父亲带到教堂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让子兴将来有个出息，含辛茹苦的徐父省吃俭用将子兴送进了本村初级小学读书。后徐子兴考人大吕戈庄以北的鲁家丘完全小学。1915年秋，徐子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青岛明德中学。以上学校均系美国基督教会所办，膳食费均由教会负担，因而徐子兴能够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继续读书。

徐子兴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且为人敦厚，具有较强的民族正义感，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当时，明德中学有一个艾牧师，此人一贯鄙视华人，傲慢至极，又经常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慨。大家要求艾牧师公布伙食帐目，他不但不予答复，反而污蔑学生无理取闹。徐子兴见此情景，无比气愤，便带领部分学生闯进艾牧师办公室，对其展开说理斗争，并揭露他的贪污行径。艾牧师见徐子兴系一名学生，对其置之不理。徐子兴忍无可忍，挥拳将其痛打了一顿，终于迫使学校公布了伙食帐目。自此，徐子兴便对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产生了怀疑。

1922年秋，徐子兴中学毕业，考入青岛邮政局，当了一名职员。1923年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来到青岛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从此青岛这个黄海之滨的工业城市，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徐子兴敏锐地觉察到，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孕育之中。但是，他这时的思想尚未完全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正处在徘徊、犹豫和观望之间。

1924年底，青岛邮局职工在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斗争。此次

运动声势浩大，终于迫使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复工的条件。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徐子兴受到很大的震动和鼓舞，他开始认识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使他对上帝是救世主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1925年初，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组织领导了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5月后，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刚从苏联回国的李慰农来青岛，领导罢工斗争，罢工斗争持续了3个月。随着罢工斗争的连连胜利，徐子兴也逐步加深了对工人运动的认识。他清楚地认清了帝国主义、反动资本家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丑恶嘴脸，明白了工人阶级要翻身只有自己救自己的革命道理。特别是日本资本家勾结军阀张宗昌，杀害李慰农同志和《公民报》主编胡信^⑨先生的罪行，以及李慰农同志在押赴刑场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共产党人的无限崇拜。同时，通过认真阅读《公民报》连载的《共产党宣言》，使他消除了对基督教信奉的最后阴影，坚定了他投入到无产阶级事业洪流中去的勇气和决心。

1926年春，在一片白色恐怖下，青岛的革命斗争形势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就在这一时刻，徐子兴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信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子兴入党后，政治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1926年春末，中共山东省委派在淄川开展工作的王星五^⑩回青岛，建立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领导青岛党的工作。王星五任书记，徐子兴等4人任干事（委员）。联合干事会的秘密活动点分别设在甘肃路33号徐子兴的住处和阳谷路32号王景瑞开设的木炭铺里。此后，徐子兴与干事会其他成员分头在钟渊纱厂和邮电局内部开展工运活动，恢复党团组织。徐子兴同赵鲁玉^⑪同志一起创建了中共青岛邮政局支部，徐子兴担任党支部书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为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徐子兴与王星五等领导的青岛“支联”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印发了大量“欢迎北伐军、拥护共产党”、“打倒封建军阀张宗昌”、“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和传单。同时还编印《青岛工报》、《胶东农报》等小报，在工人和农民中散发，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胶澳总办则惊呼“有赤化分子暗地宣传，破坏治安。”在青岛地方党组织的初建阶段，筹备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徐子兴因有邮电局正式职员的身份，工资收入相对稳定。他以党的利益为重，把党的事业同自己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每月缴纳的党费最少是5元，需要时则将月工资全部献出。他视革命同志如同手足，在

他周围的同志大都得到过他的接济。在电话局领导妇女运动的负责人赵鲁玉取保释放后，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十分艰苦。徐子兴和王景瑞^⑥两人出资，帮他买了一台缝纫机，开了一家缝纫铺。赵鲁玉便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在青岛疯狂搜捕共产党人，破坏党团组织。中共青岛支联书记、日商投资的钟渊纱厂工运领袖王星五同志不幸被捕，日本资本家企图收买警察局将其杀害。徐子兴获悉情况后，心急如焚，立即赶到王星五家中，对其家人在精神上给以安慰，在经济上不遗余力地予以资助。同时，与支联其他成员一起研究营救王星五同志。在研究中，徐子兴提出用火烧钟渊纱厂的做法，迫使厂方和当局放弃杀害王星五的阴谋。此计划尽管没有实施，却将日本资本家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怕激起工人更激烈的反抗，终未敢勾结当局下此毒手。此后，敌人在青岛对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徐子兴等领导的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被迫停止了活动。

1927年10月，徐子兴任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自此，他的家成了市委三大联络点之一，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徐子兴的家是“市委之家”。每逢市委在他家开会或接头时，他的妻子总是抱着孩子在外面站岗放哨，如发现稍有可疑处，便立即通知与会人员马上撤离。从而，使市委在他家中的一切活动，从未遭到一次破坏。

徐子兴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非常俭朴，而为了革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他却从不计较，慷慨解囊。徐子兴由于邮电局职业的公开身份，月薪80余元，他将大部分薪金都交给党组织做了活动经费，同志们也吃他的、花他的。而他自己家却要夏天典当棉衣，冬天典当单衣过日子，孩子们吃的穿的都很差，生活艰苦。

每逢春节来临，妻子李毅都要劝说徐子兴：“平日孩子穿的象叫花子，要过年了，是不是给他们扯上一件新褂子？”徐子兴总是体贴入微地劝说妻子：“我看就凑付着穿吧，还是省下点钱来办些大事……”象妻子的这样起码的要求，常常被他婉言拒绝。1928年春，徐子兴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但是，这给徐子兴带来不是喜，而是忧。他疼爱自己的儿女，更热爱党的事业。多一个孩子就多一张嘴，还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不便。徐子兴与妻子商量后，忍痛将刚出生的亲骨肉送进了“收婴箱”。平日，徐子兴除忙于公开职业外，其主要精力还要放在市委和邮政党支部的地下工作上。由于工作繁忙，经常数日不能回家。他的二女儿患了白喉症，全身发烧，昏迷不醒。妻子急着想送孩子去医院治疗，但手头无钱，此时徐子兴正在外边到处奔波，行踪不定，一时无法找到。等到徐子兴回家时，二女儿已因高烧不退而永远地闭上了

双眼……

1928年夏，市委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更有力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决定动员党员购买枪支。徐子兴同妻子李毅商量，将她结婚时娘家陪送的192元银洋全部拿了出来。接着，徐子兴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市场二路的日本西肥洋行买了4支手枪交给了党组织。

1928年秋，蒋介石在山东残酷地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山东的党组织处于极其困难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王复元^⑨和担任过省委交通员的胞兄王用章^⑩（叛变后改名王天生）相继叛变投敌。由于这两个叛徒的出卖，省委机关遭到毁灭性破坏，邓恩铭等17名同志逮捕，山东省委受到重大损失。王复元投敌后，被国民党任命为捕共队长。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沿胶济线一路东下，在连续破坏了淄博、张店、潍县、高密、胶县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后，又到了青岛，破坏青岛市委机关多处，致使山东、青岛地下党的活动陷入困境，处于十分危险的地步。因此，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指示：“目前山东的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问题。叛徒王复元一定要解决，否则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同时，周恩来同志还亲自派其警卫员张英前来山东协助除奸。

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部署。为了准确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向党组织提供可靠的有关情报，市委决定派一名同志以“自首”的名义打入敌人内部。王复元当年曾是徐子兴的入党介绍人并在一起工作过，要打入敌人内部，徐子兴算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党组织决定由他来担当这一重任。徐子兴素来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硬汉子。他明知充当这一差使，在同志间会因不明真相而遭到唾骂，在匪巢中稍有不慎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把这一切统统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3月下旬，市委接到了省委“4月1日叛徒王复元去青岛”的情报。徐子兴一切准备妥当，便于当天到火车站同王复元会面，并向他表示了愿意投靠其手下的意愿。经过一番巧妙地对答，终于解除了王复元的狐疑，骗得了他的信任，当上了他的“捕共队员”，从而较顺利地打入了敌人的内部。阴险狡诈的王复元为了使徐子兴死心塌地为其效力，他除对其暗暗防范外，还故意在被捕的党员中散布，他们的被捕是徐子兴“自首”后提供的情报，以此来挑起同志们对子兴的仇恨。于是，徐子兴“自首叛变”的消息不胫而走，此后，他碰到和听到的只有鄙视和冷遇、谴责及唾骂。而他每想到自己所担任的特殊任务，便只好忍辱负重缄默结舌，不使半点机密泄露，并且更

加激励他坚决完成任务的信心。

张英来到青岛后，市委又决定派王科仁同志扮成烟糖小贩一起担负除奸任务。但是，他俩都不认识王复元，且王复元又行动诡秘，无法判明，这给除奸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眼下，关键的问题是想法搞到王复元的照片以及掌握他的行踪，而这一任务又必然地落到了徐子兴的肩上。徐子兴利用邮局检信员和“捕共队员”的身份之便，经过一番周折，担着很大风险，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弄到了王复元、王天生兄弟的四张照片，为后来张英、王科仁闹市除奸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子兴打入“捕共队”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通过各种可靠的关系，及时准确地为市委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市委根据这些情报，及时地采取果断措施，使青岛的党组织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1929年8月上旬，徐子兴从敌谍报队员郭金祥口中得知，我地下党员丁维尊、孙秀峰已叛变投敌，从而使我省委交通员王焕章等几名同志被捕。徐子兴获悉后，经反复核实后认为，丁维尊熟知青岛地下党的机密和联络点，如不赶快解决，必将给党组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省、市委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处决丁维尊。8月10日深夜，张英到了云南路汇兴里二楼丁维尊的住处，以“传达中央重要指示”为由，将其诓了出来。当走到滋阳路附近时，丁维尊预感不妙，拔腿就跑。张英眼疾手快，当即拔枪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击毙在滋阳路口。

丁维尊被处决后，大叛徒王复元吓得如惊弓之鸟，整日深居简出，不敢露面。几天后，徐子兴准确地获悉王复元将于8月16日下午6时，去山东路（今中山路）110号“新盛泰”鞋店，他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市委。

16日下午6时，王复元坐着一辆挂着车帘的黄包车来到了“新盛泰”鞋店。他惟恐被人发觉，从车里一钻出来就立即窜进了店门。这时，早已从照片上熟记了王复元面孔的张英、王科仁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他俩已提前作好了行动分工，当王复元窜进店里后，王科仁紧随其后跟了进去，并以买鞋为名暗中紧紧地盯住王复元不放。当王复元提着鞋盒刚跨出门槛时，王科仁从其背后连开数枪，恐其不死，王科仁又抢前一步连补3枪，罪大恶极的王复元就这样当场毙命。此刻，负责在门外担负警戒的张英，迅速接应王科仁跨过繁华的中山路，旋即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王复元的可耻下场，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大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省、市委党组织的同志无不赞誉徐子兴、张英、王科仁三同志在除奸斗争中的敏锐勇敢，为党做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击毙王复元后，党组织决定，让徐子兴同志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徐子兴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